“中国经济：从数量转向‘新常态’”

——《习近平：正圆中国梦》选载

□ 〔俄罗斯〕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新常态”

如果将十八届四中全会看成是建设工地的话，那么习近平提出的“新常态”理论则是为发展中国经济、改造现有宏伟但不够牢固的大厦，全力打造一块更新、更深、更稳的基础。“新常态”是习近平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的。从习近平讲话、中国媒体评论解读、国外专家观点中可以看出，“新常态”的理论创新之处正在于此。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致使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来换取中国高速发展的时代正在过去。打造高质量的经济结构、维持行业间地区间平衡、提高资本利用率、节能减排的时代已经到来。

完全依赖外部市场、不惜一切代价吸引外资的时代正在过去。满足内需、大力改善城乡居民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差距的时代已经到来。

为世界生产链条中输出大量廉价劳动力、并将大把的金钱投到美国控制下的金融体系的时代正在结束。依托本国科技成果，生产高端竞争力产品、创建独立的金融体系、确保中国全球贸易利益的时代已经到来。

事实上，中国人并未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底宣布中国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而欣喜若狂，中国也没有因2014年GDP增速降至7.4%而感到士气低落。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余斌也并非是火上浇油，他认为，中国未来10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将保持在6%~7%的区间范围内。

他认为，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分为起飞、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中低速增长、增速回归五个阶段。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迎来“新常态”，经济平稳增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提质增效步伐加快，公共预算收入与GDP同步增长。

为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中国开始解决因“高速发展”而累积的问题。政府公布了细则，解释农村流动至城市的人口如何能更易获得登记证，即“户口”，但目前仅在人口低于500万的城市中推行。为了加速推进工业从利用煤炭向其他能源转变、改善生态环境，政府还提高了相应的税赋。

2014年末，中国宣布参照上海自贸区的试点，在广东、福建以及直辖市天津建立了3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初即取消了人民币业务限制，简化了外资企业注册流程，放宽了外资进入服务领域的限制。但设立自贸区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吸引外资，而是试行一系列国家管理外资、国际贸易、金融的新规定，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财政改革试验”的进展并不像2013年9月提出时设想的那样顺利，但这种试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其经验都是有益的。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经济特区试验，在深圳发展受阻时，珠海、汕头、厦门很快赶上来。习近平在上海进行的自贸区试验是接过了其父亲习仲勋建立第一批经济特区的接力棒。

人民币走出阴影

让中国货币走出世界金融市场的阴影，这是“新常态”理论的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最重要的创新。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已签订了几十份以人民币作为主要结算货币的协议。根据Swift支付系统的数据，2014年12月，人民币在世界金融市场中已成为第五大常用支付货币，用人民币支付的份额占到2.17%，与日元非常接近，其份额占到2.69%。而美元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竞争力了，其全球份额约占45%。

中国对其他国家经济的投资正成为这些国家发展必不可少的加速器。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为108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其他国家当年对中国投资的总和。

中国正从资本输入国转为资本输出国。中国正积极构建或参与构建能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相抗衡的国际金融体系。

2015年，总部设在上海、注册资金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已开始运行，中国是其最大股东。

2014年11月，中国设立的400亿美元丝路基金正用于研究从中国到东欧、西欧这条重要贸易通道的项目。2015年1月底，中国宣布建立注册资金200亿美元的能源开发基金，以补充丝路基金。

2014年10月建立的注册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大部分资金将由发起者中国注入，银行总部设在北京。

不久前习近平表示，在接下来的10年中，中国投资输出将达1.25万亿美元。中国资本输出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新趋势，中国有着超过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大大改变全球投资环境。中国的“新常态”将很快变成其所有伙伴的“新常态”。

※ ※ ※

采访谢·尤·格拉济耶夫院士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总统顾问，经济学博士）

尊敬的谢尔盖·尤里耶维奇先生，您怎样看待前不久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为什么一些俄罗斯专家不惜重墨来描绘中国的现实和前景？

中国的经济奇迹令世人震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已从世界经济舞台的边缘突然跃入领导者行列，2014年其GDP规模和高技术产品出口都位居世界第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80年至2007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从2.19%增至10.94%，随后5年升至14.92%。

中国经济奇迹震惊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因为这与世界整体环境是不相符的。中国领导人没有采取俄式“休克疗法”，即将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体制直接调整为市场化机制，而是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中国致力于通过渐进式改革，为私营企业主创造条件，妥善处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化机制的对接。在苏联的改革者以“轻装前进”的冒险精神摧毁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时候，中国的改革者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地架起沟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桥梁。

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指导方针与后苏联式的实用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是一种创新的改革思路。这一指导方针被习近平主席丰富后鲜明地提了出来。习近平及其“智库”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标志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之后采取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和新的理论升华——“新常态”，为强化三个市场（国内市场、欧洲市场和全球市场）间的高水平互动，开辟了新的前景。

中国政府所作出的理论突破和政治决定并非建立在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教条之上，而是以实际工作经验为基础的。像正在做新汽车结构设计的工程师一样，中国的领导人通过解决具体问题、做试验、选择最佳方案，逐步优化调整好新的生产。他们耐心地、一步一步地设计了自己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国家管理体制。在保留“高层指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引入了市场调节机制，把私人和集体经济形式作为国有制的补充，提升经济效率，争取2049年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战略性目标。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辩护者不去关注中国改革的关键因素，相反，他们以中国经验为武器，给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杜撰出一系列“客观解释”，要么得益于外国投资，要么模仿西方技术，要么是大量廉价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工业，等等。所有这些“客观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仅仅是一定程度上，因为他们忽略了最主要因素，那就是中国领导层创造性地对待完善生产关系的新体制，随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这种新体制将更加完善、更有吸引力。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使其经济迅速发展。虽然现在速度优势已经不那么明显，但中国经济依然像从前一样，以令其他大国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着。这里有没有一些根本原因？

在我们看来，一种新的、较之以前更有效的社会经济体制正在形成。世界发展的重心正在向东亚转移，不少研究者正在谈论一个资本积累长周期——亚洲的——新开端。在500多年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先后出现了西班牙的、荷兰的、英国的和美国的资本积累长周期，正在形成的亚洲周期在创建自己的结构体系，在利用以往物质技术成就的同时，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中国人把自己的发展阶段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保留了很多社会主义元素，同时也发展私有经济，扩展世界级的资本公司和合资公司。中国的领导人依然是共产党员，他们继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经济上避免用这些意识形态语言，提出独创的概念“中国梦”，以消除贫困、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然后再迈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同时，中国领导人近两年来重点强调解决社会不公问题，保留了以按劳分配为基础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经济调节机制的主要目标是刺激生产活动，为发展生产力提供长期投资。在正成为亚洲资本积累周期核心的国家中，中国最有吸引力。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国家计划和市场的自我调节相结合，国家调控主要经济参数与自由经营相结合，坚持共同富裕与鼓励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相结合。

2013年和2014年党的中央全会作出的决定及随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都旨在为中国未来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国家不仅下达指令，而且发挥主持人的作用，在社会群体之间建立社会伙伴和协作机制。官员不再担任企业领导人，而是组织实业、科技、工程等各团体一起工作，制定共同的发展目标，研究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

国家经济调控机制正是针对此。国家应提供长期、低息信贷，而商人确保这些贷款专款只用于发展生产。国家应保证自然垄断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设施和服务，而企业则负责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国家应组织并资助那些重要的研发设计、教育和人才培养，而企业家则要专注创新、投资新技术。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和提高生活质量方面，国家和私人的伙伴关系要服从公共利益。国际合作思路也在相应地发生着变化：那种满足大国利益的自由主义全球化被满足全人类利益的全球化所取代。

与美国积累周期为了保证自己资本的利益而进行武装干涉、革命和在世界各地支持政变不同，亚洲资本积累周期是在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建立互利的合作机制。由中国、俄罗斯、印度共同参与完成的欧亚一体化项目完全建立在自愿、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也同样如此，欧亚经济联盟同样会以此为原则运作。欧亚经济联盟的所有国家与中国都有着共同的长远利益和战略伙伴关系，贸易在发展，相互投资在增加，合作关系在拓展。

俄中两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强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发展两国经济、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具有重大意义。这在两国货币互换、创建联合研发机构、打造中俄经贸合作区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未来，通过创建欧亚乃至世界最大的共同经济发展空间，将有效凝聚欧亚大陆各国的经济竞争优势。因此，保持各国的独特性，将有助于推动文化、法律、政治体制和经济实践的多样化发展。

中国领导层很谦虚，继续把自己的国家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然而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已达到世界先进国家水平。此外，中国高效的生产关系结构使它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榜样，这些国家试图复制中国经济奇迹、拉近与亚洲资本积累周期核心圈的距离。俄罗斯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其他国家应从这一现实出发，研究中国业已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它们不是过渡性的，而是本世纪最先进的社会经济体制。我们要学习和汲取中国的发展经验，如同以前中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一样。

把握“三严三实”的三个维度

□ 陈俊卿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继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又一次持续推进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剔除党内存在的问题和疾病的重要举措。

是什么：“三严三实”的核心要义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强调的是领导干部要严守道德底线、权力红线和纪律高压线这三条线。有人守住了道德底线，但是没有守住权力的红线；有人守住了纪律高压线，却没有坚守道德底线。“三严”强调的是道德、权力和纪律三种约束机制的统一。

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强调的是领导干部干事立业、为人处事的基本要求。谋事和创业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还是为了老百姓多得实惠？这是我们干事立业、做人做事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三严三实”既是制度上的约束，又是对个人品德和道德的要求，它明确了新的历史时期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精神风貌、优良品质和道德境界，是我们执好政、用好权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为什么：践行“三严三实”的现实意义

“三严三实”的提出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针对的就是党内存在的“不严不实”作风。“不严不实”产生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贪求个人利益与享受。在一些人那里，权力、谋事、创业不是为人民而是为他的配偶、子女、亲属去谋利。贪图个人的利益和享受，在宗旨意识上发生了偏差，在价值观的选择上发生了位移。

“不严不实”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错误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实”就是干事、谋业等所有工作要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这叫做人要实，谋事要实。一些地方搞一些所谓标志性的建筑，一些国家级贫困县搞形象工程，这便是一种错误的政绩观，是给上级看的，不是给人民群众看的。

“不严不实”产生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唯上思维，不深入基层联系群众。搞一些虚的东西，应付上级检查，回去以后写个报告，写份报道，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避免。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这个“实”字虽然很简单，但却意味着所有的工作都要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

怎么办：践行“三严三实”的具体要求

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严以修身，要有高尚的价值观与人生观，要有一种大的气度、大的境界、大的从容。

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要了解实情就要接地气，深入群众。怎样察民情、汇民智呢？要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计于民就要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改革发展的智慧。具体怎么做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首先将群众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变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之后再回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和解释，变为群众的意见，使他们坚持下去。

依法用权，树立法治思维。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和能力，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一是要加强全民的普法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各级政府和各级干部要带头树立法治观念，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二是要确保对权力特别是领导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制衡，保证权力运行过程的公开透明。三是全面提升和捍卫法律的有效性、权威性、独立性，在处理一些上访案件的过程中，不要混淆法律与人情的界限，该由法律解决的坚决交由法律去办。

健全制度机制，推进制度建设。作风建设不等于制度、机制建设，作风建设只是党的建设的一个方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要在加强作风建设的同时，自觉健全、完善各项制度和机制。制度是对领导干部个体行为的规范与导向，是刚性的限制。要做到“严”和“实”，就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形成良好制度环境，减少权力寻租空间，使谋事、创业、做人真真正正落到“实”处。

进一步推进社会公平，协调收入分配，改善民生。“三严三实”不是做给上级领导看的，用权、谋事、创业，归根结底是要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要编织一张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确保网底不破，可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避免陷入生存窘境，防止冲击社会道德和心理底线。

党风党纪

宣传要善于“说话”

□ 李宗建

当前社会背景发生巨大变化，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诸多挑战和问题。

宣传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深刻复杂。一方面，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西方对华认知正在发生重要转变；另一方面，国际舆论与国内舆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越来越深，国内事件对外溢出效应和国外事件对内刺激效应相互叠加。

利益问题与价值观念问题相互交织，宣传遇到了人们价值观念物质利益化的挑战。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逻辑的彰显，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物质利益性，同时利益的分化带来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多样、多变，使主流意识形态有效引领社会思潮的难度大大增加。

新兴媒体的影响力不断增大，改变了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从报纸、广播到电视，从BBS、电子邮件、门户网站到微博、微信，每一种新的媒介出现都带来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及其相应的信息受众。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即时传播、在场传播、多媒体传播更加普遍，改变了定时、定媒体、定口径的传播模式，使得信息传播不能再按照传统模式按部就班、层级传递。同时，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相互延伸，现实社会的矛盾问题越来越多地反映在网上，各种思想舆论在网上相互叠加，两个舆论场相互作用、相互激荡。

提高宣传质量重在改进话语方式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宣传要提高质量和水平，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要着重在改进和创新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上下功夫。

在传播革命环境下要善于对主流价值观进行“再编码”。在新媒体环境下塑造主流价值观，意味着在思想观念多元多样的舆论背景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符合传播规律、受众偏好的话语方式，有效植入新媒体环境中，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以碎片化的信息实现对受众的包裹和浸润。传播革命背景下，意识形态的价值不是以简单背诵的条文来展现的，而必须以民众愿意接受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包括符合民众对信息包装、传播形式的审美要求，探索和完善新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使其能够帮助受众正确认识和理解各种矛盾、问题，并提供合理的解决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随新媒体而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给主流价值观建设带来了挑战和干扰，另一方面如若把握和运用得当，便是宣传工作借助新媒体实现质量和效果提升的重要机遇。

传统的宣传形式要在话语方式上“接地气”“暖人心”。接地气才能有底气，一方面，宣传工作要始终站在群众立场上，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充分展示和诠释群众“身边的故事”。另一方面，话语方式“接地气”要讲究“分众化”。宣传工作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多样化的群体呼唤多样化的宣传话语方式。宣传工作要敢于直面不同群体多样化、个性化的需要和诉求，善于把握不同对象的思想动态、行为特点、利益所在和信息接受习惯，针对受众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传播渠道、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既加强面的广泛覆盖、线的分类渗透，又注意把工作做到每个点上，“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以分众化的话语方式回应多样化的群众诉求。

在国际传播背景下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话语体系荷载着特定思想价值观念，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确立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谁的话语体系更具道义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谁的话语和叙事最终能打动人，谁就拥有国际话语权，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应做到两点：首先要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在国际思想文化交流过程中，必须清楚认识到，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次要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全球化时代要求我们在对外传播上要与国际接轨，不能自娱自乐，国内循环，突破点在于创造让国际社会听得懂、记得住、不反感的新词汇新术语新表达，让我们与世界有“共同语言”。所谓“打造”就是创造和加工，要求是“融通中外”，找到不同国家思想文化的交集和同类项，提炼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使我们能以让世界听得懂的话语体系，在国际上传得开的话语方式，讲清楚“中国特色”和“中国独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形成独特的话语体系，掌握国际话语权。

参考与建议